



红人堂·剡溪水暖

寻访“中国奥运之父”出生地

奥运之火，熊熊燃烧。

数天后，第33届奥运会将在巴黎拉开帷幕。回首百年奥运史，宁波人的身影如奥运会火炬，熠熠生辉。

1922年6月，王正廷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，被誉为“中国的顾拜旦”；

1936年，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，中国首次组团参赛。王正廷任总领队；舒鸿担任篮球裁判——中国第一位奥运会主裁判；周余愚参加竞走比赛并获得第23名；沈嗣良任总干事；

1948年，楼文敖代表中国参加伦敦奥运会，成为中国第一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健全人的奥运会；

1986年开始，魏纪中开始担任中国奥委会秘书，时间长达12年，被称为“中国体育产业、奥运产业之父”；

2022年9月16日，宁波成为首批“奥运冠军之城”……

如果溯源，宁波人在奥运史上的精彩华章，也许始于王正廷——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，一名民族体育事业的拓荒者。

村名，真和税收有关

宁波府奉化县金溪乡税务场村（今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税务场村），这里是王正廷的出生地。

税务场村，一个奇怪的名字，真的和税收有关么？

税务场村，曾是古鄞县东的要隘。早在宋朝前，税务场村就成为交通要冲，南通台温，北连明州；到了宋朝，这里商贾云集，朝廷在这里设立税务司，负责陆路税务。

根据南宋《宝庆四明志》记载，奉化县旧有公塘、白杜两税场，白杜税场设在税务场村。

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9月8日，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。税务场村，一个王姓基督教牧师人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。

这个孩子谱名正庭，后改正廷，表字儒堂，号子白。像许多人家一样，王家对这个孩子充满着爱恋和希望；只是大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成为“中国奥运之父”。

求学，赴北洋西学学堂

和同龄孩子相比，王正廷是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。

童年时代王正廷就读于宁波三一书院，10岁便进入上海

中英中学求学。1896年，王正廷考取天津北洋西学学堂（后改名为北洋大学），北上天津求学。

北洋西学学堂是当时全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学生必须进修体育和军事训练科目。

王正廷在《王正廷自传：回顾观来》中回忆道：

“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我们就开始脱掉长袍，剪短指甲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在那短短的两年时间里，我长高了一尺多，几乎增加了一半的体重。从那时开始，体育锻炼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爱好，同时，我也产生了想在我们国家推广体育运动的想法和动力。”

1906年，王正廷到日本工作。在异乡，他遇到了孙中山先生。1907年，王正廷加入中国同盟会。

拓荒，民族体育事业

生活在内忧外患时代背景下的王正廷，当时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，首先从“体育救国”开始：认为体育可以强身，更可以唤起团结意识。

如何才能唤醒人们？王正廷认为，举办运动会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。

远东运动会，原名“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”，和西亚运动会一起成为亚洲运动会的前身。这是1911年菲律宾、中国、日本发起和参加的一个区域性国际比赛。

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5年5月15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。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。王正廷发挥自身声望多方筹资，运动会如期举办。中国运动员取得总锦标第一的好成绩，群情振奋。

1924年8月，作为发起人之一，王正廷参加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（中国国家奥委会前身，又名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）成立大会，此后长期担任该会会长、理事长。

1932年，王正廷欢送刘长春“单刀赴会”前往美国参加奥运会；

1936年、1948年，王正廷两次作为总领队带领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。

曾有人如此称赞王正廷，“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启明星似的人物，漫漫长夜中的一缕晨曦”。



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



1932年，王正廷为刘长春授旗。

推荐榜



大江走笔
如何管好孩子的暑假？教你一个秘密武器



三耳秀才
大暑：“熟人”相见，大雨时行



摄影：秘斯特沈



庸星
六月荷花朵朵开



王国海
晋祠庙会，百余人敲响威风锣鼓



越女茶
戏·说“梦中蝴蝶”，花底人间世

红人堂·岑颖 说说《惊梦》“戏中戏”

《惊梦》是《戏台》三部曲之二，延续第一部《戏台》的结构，通过戏班子在乱世中的种种窘境，来窥人窥世；以形势胁迫之下“戏中戏”的“非正经演”与“正经演”之间的反差，造就种种喜剧效果。只不过《戏台》的“戏中戏”是《霸王别姬》，而《惊梦》的“戏中戏”则是昆曲《牡丹亭·惊梦》。从艺术上看，甚妙。

《牡丹亭·惊梦》说杜丽娘春日游园生情丝，梦见与书生柳梦梅相爱爱好。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战乱背景下，很难有演、观此剧的太平环境和闲适心境。杜丽娘春梦骤醒，正如世间一切脆弱而短暂的美之所存，何况是在时刻忧于生死的战争时期！

剧中，常少坤想扮“睡魔神”引杜丽娘入那旖旎梦境，这正如乱世里听一折《牡丹亭》，怀一个平安富足梦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《惊梦》不仅代表着精美的艺术、传承的文脉，也是世间芸芸众生一个暂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景。剧中，“秦向成”们抛头颅、洒热血为众生圆此梦。因此，尾声雪原一祭，便是给弃绝己梦而为众生圆梦的牺牲者还梦，这刻在民族血液里的感恩与慈悲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脉传承。

从戏剧结构看，《牡丹亭》的运用也颇得妙处。昆曲雅、精、美，但戏班迫于生计不得不演起《白毛女》。编导以“旧戏”与“新剧”、“规矩”与“革新”、“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等等矛盾，制造反差的喜剧结构，带来种种“笑果”。当童佩云与何凤岐以白素贞和赵子龙的行头表演喜儿和大春，当乐队演奏起昆味十足的《北风吹》，观众们不吝掌声与笑声，台上台下共同将戏推向高潮。

这种反差还向观众抛出了关于文艺之功能等命题的思考，丰富了剧作的主旨。

但比之《惊梦》之《牡丹亭》，《戏台》之《霸王别姬》的运用却更巧妙，因为它在戏剧矛盾构建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。编导围绕“谁演”和“怎么演”的问题组织了种种矛盾冲突，每组矛盾都紧密围绕“戏中戏”，环环相扣，层层推进，积蓄起巨大的艺术冲击力。相比之下，《牡丹亭》跟《惊梦》中主人公们的生存困境、人物命运转折等的联系就没有那么密切，论巧妙，也便略逊一筹了。

但瑕不掩瑜，作为喜剧的《惊梦》，仍保持着《戏台》那样的悲剧内核和底色，主创们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剧作的格调与综合水准，依然值得观众深深敬重！



剧照由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提供。摄影：李笑鸣